

## 李慈銘評議魏晉風氣之視角探蹟—— 由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對李說之徵引談起

陳勳\*

### 摘要

民國學者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與清末士人李慈銘《世說新語批校》皆是亂世之際以史學家之角度眼光研治《世說》者，屬徵實派。《箋疏》幾全引《批校》之說，於其史評尤有所肯定及回應，可見兩家學術本位與關懷之相近。余氏於李氏史評，有持否定意見者，細考之，實為治史方法、心態上之糾謬，如以空言翻案、以今律古等，與其史觀無涉。考察李慈銘對魏晉時風之評議，乃立足於「清議清談」、「政學掛鉤」、「忠孝並重」之視角。李氏生逢亂世而難預政事，故有以學術經世之志，即藉史事之臧否以明是非大義，正人心、敦風俗，其於魏晉時期不忠不孝之事，每以頹敗紀綱之罪斥之，未能回到歷史現場，考察當日政治背景之影響。李氏既以經世為首務，對人才之品評標準，則聚焦於體國經野之實用性質，而難以領略魏晉對「才性」之多元詮釋及內涵。

**關鍵詞：**李慈銘、《世說新語批校》、余嘉錫、《世說新語箋疏》、徵實派

---

\*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生。



## 一、前言

余嘉錫（1884-1955）之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（下稱《箋疏》）為研治《世說新語》（下稱《世說》）乃至魏晉學術思想之必備書。此書以史學家徵實之角度，廣引中古史料，細考魏晉故實，糾謬誤於前人，定是非於後世。<sup>1</sup>而余氏撰此書時，正值抗戰時期，四郊多壘，故亟思藉史事之發覆以彰善癉惡、借古喻今。<sup>2</sup>余氏以學術經世之苦心孤詣，已有學者抉發而條闡之，如吳冠宏分析余氏對漢末至六朝人士之批判，有三重面向，除周祖謨於〈前言〉已拈出之「風習澆薄」、「賞譽不當」兩條線索外，<sup>3</sup>「不明出處」亦為重要綱目。而此三重面向，復可以「遺事違禮」、「褒貶失實」、「不見忠義」對應其內涵。<sup>4</sup>吳冠宏亦謂余氏箋疏《世說》之重要門路，在選取歷代史評文獻以評斷魏晉時事及人物，其中於晚清士人李慈銘（1830-1905）《世說新語批校》（下稱「批校」）之評語，每因心有戚戚而援之以申己情志、暢其未言。余氏於李氏之說雖頗有商榷折衷，兩家之儒學本位立場及學術關懷，固甚接近，<sup>5</sup>宜乎楊勇以《通鑑》胡注、王若虛（1174-1243）、顧炎武（1613-1682）《日知錄》、李慈銘及余氏視為「同一論調」也。<sup>6</sup>李慈銘之魏晉學術見解，經余氏之徵引，始廣為人知，然僅限於《批校》一隅，則恐因文本之局限，而未足明李氏研治魏晉之大略。

學界於李慈銘之研究多聚焦於其詩學、史學，專文研究《世說新語批校》<sup>7</sup>者有李佳玲《李慈銘批注《世說新語》研究》，唯資料分析甚精，而論述開展不足。<sup>8</sup>劉強以「校勘訂正」、「訓解名物」、「考辨糾謬」、「批點評論」為李氏《批校》特色，囊括甚

<sup>1</sup> 如楊勇謂余氏考據詳密，並以「治學嚴謹，有乾嘉之風」譽之。楊勇：〈讀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後敘〉，收入楊勇編著：《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》（臺北：正文書局，2003年），頁78-81。吳冠宏稱余氏博覽羣籍，故能援引多重文獻，強化其史評之史料依據，並推其為《世說》史學傳統之大家。吳冠宏：〈余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《世說新語》的現象考察〉，《東華漢學》第9期（2008年12月），頁138。

<sup>2</sup> 周祖謨：〈前言〉，收入余嘉錫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前言頁4。引文中之「有感於永嘉之事」，指余氏之書後題記：「（《箋疏》）讀之一過，深有感於永嘉之事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他日重讀，回思在莒，不知其欣戚為何如也。」見同書前言頁2。

<sup>3</sup> 周祖謨：〈前言〉，收入余嘉錫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前言頁4。

<sup>4</sup> 吳冠宏：〈余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《世說新語》的現象考察〉，頁111-112。

<sup>5</sup> 吳冠宏：〈余嘉錫箋疏《世說新語》之詮釋特色及其文化意義初探〉，《成大中文學報》第22期（2008年10月），頁8-9。

<sup>6</sup> 楊勇謂：「蓋當時清談之士，既重音辭，尤尚超脫，而不重行跡形下之事；若拘拘於禮法為志，則不翅（啻）以唐宋人之見而論魏晉，猶引儒以責黃老也。其與《通鑑》胡三省注、顧炎武《日知錄》、王若虛、李慈銘同一論調，不足以預時流、參微言也。」楊勇：〈讀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後敘〉，收入楊勇編著：《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》，頁92。

<sup>7</sup> 李氏批校《世說》之底本為清道光八年浦江周心如紛欣閣刻本，此見於其《日記》：「夜校《世說新語》以李氏僭陰軒本校周氏紛欣閣本，皆明袁褰本也。」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桃花聖解齋日記·癸集》（揚州：廣陵書社，2004年），第9冊，頁6262。李氏批文後為王利器輯入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見〔清〕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223-279。

<sup>8</sup> 李佳玲：《李慈銘批注《世說新語》研究》（高雄：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（暑期專班）碩士在職專班論文），2007年。

備，然亦為初步之資料整理，未深入發揮其背後思想。<sup>9</sup>吳冠宏則點出李氏《批校》「不惟糾謬，實亦史評」之特色，然此非其文重點，故僅略及之。<sup>10</sup>他如盧敦基《李慈銘研究》、<sup>11</sup>張桂麗《李慈銘年譜》附錄之〈李慈銘綜論〉，<sup>12</sup>則未闢專章討論其《批校》或世說學。張明嘗以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李氏《批校》與余氏《箋疏》、王利器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所載者對校，補正余氏引文疏漏訛誤者數十條，有功文獻。<sup>13</sup>本文擬立基於前人研究成果，略述李慈銘之學術傾向及《批校》體例後，分析《箋疏》徵引李慈銘說之情況，輔以李氏之《越縵堂日記》、《讀史札記》及詩文集等資料，以「清流清議」、「政學掛鉤」、「忠孝並重」三大議題為核心，並結合晚清史料，探論李氏評議魏晉時風人物之視角。俾能藉文獻範圍之開拓，深化研究李慈銘魏晉學之內涵，<sup>14</sup>同時補晚清「世說學」之不足。<sup>15</sup>

## 二、李氏之學術傾向及《批校》之體例

進入本文主題之前，有必要先就李慈銘之學術傾向及其《批校》體例略作說明，以為論述基礎及背景，以下分兩段述之。

### （一）學術傾向：乾嘉緒餘

李慈銘雖因長於翰藻而名列《清史稿·文苑傳》，見擯於〈儒林傳〉，然傳統時代文人、學者之身份，往往難以截然判分，李氏〈六十一歲小像自贊〉即云：「是儒林耶？是文苑耶？聽後世之我同。」<sup>16</sup>其一生之所蘄嚮仍在經史學術，故自謂「詞章乃學人之遊藝。」<sup>17</sup>及身故後，世始重其學術，如修撰於民初之《清儒學案》，即首稱其

<sup>9</sup> 劉強：〈李慈銘《世說新語》批校的特色與價值〉，《名作欣賞》2019年第11期，頁65-69。

<sup>10</sup> 吳冠宏：〈「玄解」《世說》：以「海岱清士」、「見此張緩」兩則為示例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70期（2021年12月），頁4。

<sup>11</sup> 盧敦基：《李慈銘研究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博士論文，2010年）。盧氏後據其博論增補而成的專書亦未提及李慈銘之魏晉學術研究，參見盧敦基：《彷徨歧路：晚清名士李慈銘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2年）。

<sup>12</sup> 張桂麗：《李慈銘年譜·李慈銘綜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377-439。

<sup>13</sup> 張明：〈《世說新語箋疏》所載李慈銘批校校正（一）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9年第4期，頁49-57。張明：〈《世說新語箋疏》所載李慈銘批校校正（二）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9年第5期，頁52-58。

<sup>14</sup> 如劉強所編《世說新語資料彙編》之「李慈銘」條，但據《越縵堂讀書記》、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、《晉書劄記》之有關《世說》者錄入，於《越縵堂日記》則多有遺漏，僅取寥寥三條。參見劉強主編：《世說新語資料彙編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20年），上編，頁490-537。然《日記》中論及《世說》人物處不少，皆與《世說批校》之說足資相證。

<sup>15</sup> 李慈銘及其《批校》實為晚清世說學之重要一環，劉強調《批校》之篇幅宏大，洋洋三萬數千言，為前代《世說》研究所無，亦為後世李詳、劉盼遂、程炎震、沈劍知、余嘉錫諸人開創一校注箋疏之範式。劉強：《世說新語研究史論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261。

<sup>16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六十一歲小像自贊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中冊，頁1012。

<sup>17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書沈光祿起元題水西書物藏書目錄後》，中冊，頁901。

學：「尊客洞明三禮，尤精小學，博極群書，勤於攷訂。……生前為詞章之名所掩，歿後遺書漸出，學者服其翔實，翕然稱之。」<sup>18</sup>李氏於書無所不窺，<sup>19</sup>而自謂「所學於史為稍通」，<sup>20</sup>其最為後人所重者亦在史部。<sup>21</sup>李氏之史學興趣萌發甚早，年少時即已讀《通鑑》、《通志》：

幼喜觀史，先君子督課嚴，乃竊發此藏涑水《通鑑》、鄭樵《通志》讀之。<sup>22</sup>

後雖喜詞章之學，而後即悔而專志於史：

自悔少時，頹惰失業，惟知雕鏤月露，綴合蟲魚，溺志殫精，以為能事。八九年來，粗知自返，而經義充塞，莫知所從，乃先事乙部，涉獵殆遍。<sup>23</sup>

王重民嘗輯李慈銘《越縵堂日記》中論史部分及所藏諸史批校為《越縵堂讀史札記》。計有《史記札記》二卷、《漢書札記》七卷、《後漢書札記》七卷、《三國志札記》一卷、《晉書札記》五卷、《宋書札記》一卷、《梁書札記》一卷、《魏書札記》一卷、《宋梁北魏隋書札記》一卷、《南史札記》一卷、《北史札記》三卷。共十一種，三十卷，<sup>24</sup>用力不可謂不勤。由此亦可見李氏頗仰慕乾嘉樸學之風，<sup>25</sup>蓋「札記」之體，盛於乾嘉，及咸同間，流風猶未墜。<sup>26</sup>梁啟超謂其十六七歲時遊京師，尚獲交當時耆宿數人之守樸學遺風而不替者，而謂「大抵當時好學之士，每人必置一『笥記冊子』，每讀書

<sup>18</sup> 徐世昌等編纂；沈芝盈、梁運華點校：《清儒學案·越縵學案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卷185，第7冊，頁7145。

<sup>19</sup> 李氏知交平步青曰：「君自謂於經史子集以及稗官、楚夾、詩餘、傳奇，無不涉獵而懶放之，而所致力者莫如史。」〔清〕平步青：〈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尊客傳〉，收錄於閔爾昌編：《清碑傳合集·碑傳集補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第4冊，卷10，頁3186。

<sup>20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白華絳跗閣詩初集自序》，中冊，頁788。

<sup>21</sup> 民初汪辟疆嘗謂：「越縵喜談經學，實非所長。一生學術，乃在乙部。」汪辟疆：《汪辟疆說近代詩·近代詩人小傳稿·李慈銘小傳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125。張寅彭亦曰：「李越縵一生學術蒼萃於《日記》，其學貫通四部，大抵以能守傳統學術之正宗為其根本性質。四部之中，略以史部為較長。」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張寅彭等編校：《越縵堂日記說詩全編·前言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2。

<sup>22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丙集上》，第1冊，頁376。

<sup>23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與顧河之孝廉書》，中冊，頁818。

<sup>24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·總目錄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9-10。

<sup>25</sup> 李氏自謂：「二十五以後，更喜治經，為漢學。」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荀學齋日記·後甲集之下》，第17冊，頁12334。

<sup>26</sup> 略舉當時著名學者之著作，可見一斑，乾嘉間如：閻若璩《潛邱笥記》、臧琳《經義雜記》、王鳴盛《蛾術編》、趙翼《陔餘叢考》、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、桂馥《札樸》、孫志祖《讀書脞錄》、李惇《群經識小》、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、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、陳鱣《簡莊疏記》、洪頤煊《讀書叢錄》、嚴元照《娛親雅言》、俞正燮《癸巳類稿》，道咸間如陳澧《東塾讀書記》，同光間如孫詒讓《札迻》。

有心得則記焉。蓋清學祖述顧炎武，而炎武精神傳於後者，在其《日知錄》，梁氏復推原「札記」之性質，本非撰述，不過視為著書之材料，「然清儒最戒輕率著書，非得有極滿意之資料，不肯泐為定本，故往往有終其身於預備資料中者。」<sup>27</sup>李氏之史部札記即類此，往往於首摘錄原文，次廣徵史料，考訂異聞訛字，末下以評論案語。而內容以「校勘」之篇幅最多，「注史（補充及駁正舊注）」則次之，<sup>28</sup>與《世說批校》之性質相同。李氏史學之上繼乾嘉，楊樹達已條貫其脈絡。楊氏分中國傳統之治史者為兩派，曰「批評派」、曰「考證派」，而二派之中又各有二枝：

「批評」之第一枝曰：批評史籍，如劉子元、鄭漁仲、章實齋之流是也；第二枝曰：批評史實，如胡致堂、張天如、王船山之流是也。<sup>29</sup>

楊氏謂「批評史籍」之流，自劉、鄭、章以後，世不多見。而「批評史實」之流，盛於自宋至清初之時。然清儒學風崇實惡虛，「懲於批評史實之虛而無當也，故變其道而趨於考證」，蓋轉主觀之批評為客觀之考證，則史事之草灰蛇線、隱微曲折，經史家層層導引，瞭然於讀者目前，則無庸史家褒貶而是非自明也。由是考證派之兩枝，於乾嘉之際同時興起：

考證之第一枝曰：考證史實，如錢竹汀、洪筠軒之所為是也；其第二枝曰：鈎稽史實，如趙甌北、王西莊之所為是也。<sup>30</sup>

楊氏復謂繼乾嘉之後者，以第一支為盛，並亟推李氏之史學，可「承錢（大昕）、洪（頤煊）之流，而為有清一代之後殿者也。」<sup>31</sup>然張舜徽則頗輕詆其學術，如謂李氏平日之涉覽，「全在宋、元、明人說部書。於經學小學，用力本淺」、「雖有涉獵之功，竟無專精之業」、「至於究心乙部，亦特常窺錢大昕、王鳴盛、趙翼三家書，以資口給」、「平日所汲汲者，不過奉乾嘉諸儒羣經新疏數部，覽筆記數卷，自炫博雅，睥睨當世」云云。<sup>32</sup>李氏之學術得失，非本文討論重點，然張氏之評論雖與楊氏異趣，二人所述李氏治學之蘊嚮則無別也。<sup>33</sup>

<sup>27</sup>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·劄記與函札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105-106。

<sup>28</sup> 盧敦基：《李慈銘研究》，頁88-91。

<sup>29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·楊樹達序》，頁5。

<sup>30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·楊樹達序》，頁5。

<sup>31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·楊樹達序》，頁5。

<sup>32</sup> 張舜徽：《清人文集別錄》（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506-507。

<sup>33</sup> 李慈銘於日記中曾載其架上群書，幾乎皆清儒考訂經史之著述，由此亦可見其學術旨趣。見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王集》，第4冊，頁2237-2238。

## (二)《批校》體例：校注考評

李慈銘之《批校》，既循乾嘉諸儒之門徑，故以校訂文句，考索史實為主。此書批校總計 272 條，可分為「校」、「注」、「考」、「評」四大類。<sup>34</sup>以下各略舉數例以明之：

1. 「校」者，校勘文字之謂，此類佔比最重，凡 179 條。可細分為本校、他校、理校三項。如〈言語〉65，注引《羊氏譜》曰：「（羊）權字道輿，徐州刺史悅之子也。仕至尚書左丞。」李曰：「悅當作忱。卷中〈方正〉篇兩見，皆作忱。」<sup>35</sup>此引同書他篇為本校。

又如〈言語〉53：「庾穉恭以毛扇上武帝。」李曰：「武帝當作成帝。《晉書·庾懌傳》言是懌上成帝。成與武字形相似也。各本皆誤。」（頁 124）此引《晉書》為他校。

又如〈文學〉45：「于法開與支公爭名，後精歸漸支，意甚不忿。」李曰：「精當是稱之誤，忿當是伏或是平之誤。然各本皆同，《萬曆紹興志》引《世說》亦如是。」（頁 253）此無異文可據，以語義之通暢為理校。

2. 「注」者，箋注發微、訓釋名物之謂，凡 68 條。<sup>36</sup>有注僻詞者，如〈言語〉8 之「漁陽摻槌」，李氏引徐錯語：「三槌鼓也。以其三槌鼓故，因謂之參。」（頁 71）

有注讀音者，如〈言語〉32：「衛洗馬初欲渡江」，李曰：「案『洗馬』之『洗』，讀為『先』，去聲。」（頁 103）

有注名物者，如〈雅量〉8：「便舉櫟擲其面。」李引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等辭書釋為「扁榼」。（頁 388）

有注方言者，如〈雅量〉10 之「兩娑千萬」，李曰：「娑字蓋當時方言，如馨字、阿堵字之比耳。」（頁 390）

有注人名者，如〈賞譽〉54：「戴若思之巖巖。」注引虞預《晉書》謂「戴儼字若思。」李曰：「戴若思本名淵，晉書因避唐高祖諱但稱字。此云名儼，是若思有二名也。」（頁 500）

有注地名者，如〈術解〉7：「郭景純過江，居於暨陽。」李曰：「暨陽，晉屬毗陵郡，即今常州府江陰縣。」（頁 779）

<sup>34</sup> 以上分類參考劉強之說而微有調整。劉氏分為：「校勘訂正」、「訓解名物」、「考辨糾謬」、「批點評論」。見劉強：〈李慈銘《世說新語》批校的特色與價值〉，頁 65-69。

<sup>35</sup> 余嘉錫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），頁 137。以下隨文注皆據此本。

<sup>36</sup> 〈賞譽〉91 引李氏注，為王利器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所漏輯，此處一併計入。見余嘉錫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頁 521。

有注古制者，如〈輕詆〉21之「箸膩顏帡」，李曰：「案《晉書·五行志》：『魏造白帡，橫縫其前以別後，名之曰顏帡。至永嘉之間，稍去其縫，名無顏帡。』據此，則江東時以顏帡為舊制，故道林以膩顏帡諷之。」（頁929）

有注史實者，如〈識鑑〉11：「諸葛道明（恢）初過江左，……先為臨沂令，丞相謂曰：『明府當為黑頭公。』」李曰：「王導臨沂人，故稱恢為明府。漢人稱明府皆屬太守。晉以後始以稱縣令，蓋尊崇之若太守。然而至今以為故事，不知本義矣。」（頁436）

3.「考」者，考辨史傳謬誤之謂，凡57條。如〈言語〉42：「摯瞻曾作四郡太守。」注引《摯氏世本》：「中朝亂，（摯瞻）依王敦為戶曹參軍，……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。瞻諫曰……敦反，乃左遷隨郡內史。」李曰：「案反當是怒字之誤。是時敦未反也。其後與第五猗拒敦被害，時敦方為元帝所倚任。《晉書·周訪傳》至稱為『賊帥杜曾、摯瞻、胡混等』，則其冤甚矣。」（頁113）

又如〈方正〉23「元皇帝既登阼」條，注引《中興書》所載，謂與《世說》不合。李氏考以簡文帝、周顛之生卒年，斷定《世說》所謂周顛「苦爭懇切」為「虛誣」。（頁336）

4.「評」者，評論史事，藉示褒貶之謂，凡18條。有鍼砭名士風流者，如〈企羨〉6載孟昶歎王恭之風姿為「神仙中人」，李譏孟昶為「奴顏乞相」，復斥王恭「學術全無，驕淫自恣……首創亂謀，妄清君側。要求既遂，跋扈益張，再動干戈，連橫群小」，而以晉室之覆滅引咎於斯：「金行之亡，實為罪首。梟首滅族，未抵厥辜」，末則歸結於「當時嘆為名士，後世載其風流，六代陵遲，職由於此。」（頁700）又如〈簡傲〉6載王澄「脫衣巾，徑上樹取鵲子。涼衣扞闔樹枝，便復脫去。得鵲子還，下弄，神色自若，傍若無人。」李氏詈為「直是無賴妄人，風狂乞相。以為簡傲，何啻寤言？晉代風流，概可知矣。舍方伯之威儀，作驅烏之兒戲，而委以重任，鎮扼上流。夷甫之流，謀國如是。晉之不競，亦可識矣。」（頁850）

有排詆清談之習者，如〈德行〉12載「王朗以識度推華歆」，而張華謂：「王之學華，皆是形骸之外，所以去之更遠。」李氏大不以為然，曰：「華守豫章，兵至即迎；王守會稽，猶知拒戰。華黨曹氏，發壁牽后；王被操征，積年乃至。此蓋所謂『學之形骸之外，去之更遠』者也。二人優劣，不問可知。晉人清談如此。」（頁15）張華此論，乃純粹之人物風神賞鑑，而李氏則帶入道德之視角，以華、王二人表現之忠為評判高下之依據，並隱然以「是非不分」批判晉人之清談。



李氏甚重人倫秩序，故評語每有發揚忠孝者，如〈任誕〉23 載阮籍喪母而圍棋如故，李氏為之辯護曰：「嗣宗晦跡尚通，或者居喪不能守禮，何至聞母死而留棋決賭，臨葬母而飲酒烹豚？天地不容，古所未有。此皆元康之後，八達之徒，沈溺下流，妄誣先達，造為悖行，崇飾惡言，以籍風流之宗，遂加荒唐之論。」（頁 807）歸罪於放達之流假飾悖行之虛構。又如〈品藻〉4 載諸葛瑾及其弟亮及從弟誕，各在一國，而時諺以為「蜀得其龍，吳得其虎，魏得其狗」。李氏以諸葛誕「名德既重，身為魏死，忠烈凜然，安得致此鄙薄之稱？」並遷罪於「司馬之黨，造此穢言，誣讎不經，深堪髮指。」（頁 556）

由上述舉例可知，四大類中以「校」最多，「評」最少。然多有同一條中兼具兩種性質者，如〈政事〉3 注引虞預《晉書》：「宗人謂宣帝曰：『濤當與景、文共綱紀天下者也。』」李曰：「案『宗人』下當有脫字。《晉書》言濤與宣穆後有中表親。宣穆後者，司馬懿夫人張氏也。此云景、文者，指懿子師、昭，乃後人追述之辭。然對父而生稱其子之謚，有以見預書之無法。」（頁 183）兼有「校」、「考」之性質。

又如〈方正〉18 注引《孔氏志怪》：「春暖，溫也，願休，強也。即字溫休。溫休蓋幽婚也。」李曰：「案《搜神記》作『姨曰：我外甥也，即字溫休。』案溫休，幽婚為反語。……蓋漢以後俗稱從母曰姨，沿其父之稱也。……溫休即女小字，故以為幽婚之先兆。……今本《搜神記》以溫休為兒之字，蓋由後人誤改。」（頁 330）兼有「校」、「注」之性質。

### 三、《箋疏》徵引李說分析

學界雖頗有論及《箋疏》徵引李說之情況者，然較簡略。<sup>37</sup>此節首述《箋疏》采錄李說之情況，續以余氏對李氏史評之駁議：

#### （一）《箋疏》采錄李說情況

《箋疏》引清末民初學者凡三家，即周祖謨〈前言〉所提及之李詳《世說箋釋》、程炎震《世說箋證》及李慈銘《世說批校》。<sup>38</sup>全書總計 1693 條箋疏，引李詳說 70 條、引程炎震說 581 條，引李慈銘說 253 條。<sup>39</sup>《批校》內容總計 272 條，為《箋疏》所采者有 244 條，佔約李書之八成以上，而餘下 28 條未見采者，除一條評語外，大抵皆校語。推考余氏不取之因有三：

1. 程炎震說與李說重複，而程說大抵較精，故余氏但取程。如〈賞譽〉8「卞令目

<sup>37</sup> 如上引李佳玲：《李慈銘批注《世說新語》研究》、劉強：〈李慈銘《世說新語》批校的特色與價值〉二文。

<sup>38</sup> 周祖謨：〈前言〉，收入余嘉錫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前言頁 4。

<sup>39</sup> 《箋疏》除采自《批校》外，尚有《越縵堂日記》（〈德行〉42、〈言語〉42、69、〈容止〉23、〈輕詆〉6）、《晉書札記》（〈方正〉59、62、〈惑溺〉5）及程炎震所引校語一條（〈品藻〉50），共 9 條。

叔向條」，李氏節引周嬰《卮林》，<sup>40</sup>而程氏則全引之（頁 495）。又如〈棲逸〉8，程說與李說俱釋「孱陵」地名，然前者較詳（頁 724）而後者較略。<sup>41</sup>

2. 余氏見解有異。如〈賞譽〉116 注引孫綽〈惓諫敘〉，李曰：「『諫』疑是『誅』之誤。」<sup>42</sup>余氏則徑據景宋本出校。（頁 533）又如〈賢媛〉12：「欲以妹妻之，乃白母。曰：……」（頁 752）李氏以為「母」下當重「母」字，<sup>43</sup>余氏蓋以為此不必出校而文義亦通。

3. 余氏引而未著李氏之名，如〈言語〉10 余氏案：「『或云』當作『咸云』，各本皆誤。」（頁 77）然此實出於《批校》。<sup>44</sup>又如〈言語〉69、70（頁 141、143）二則之案語，亦出自李氏。<sup>45</sup>張明謂此疑是《箋疏》整理者誤以李批為余氏案語，<sup>46</sup>可從，蓋余氏治學嚴謹，言必有據，且此數處引文皆枝末，非關宏旨，亦無足掠美。

《箋疏》引李說後多有補說或駁正，非徒以之張目而已。於「注」、「考」、「評」類文字後之案語尤多，下舉例明之：

〈文學〉57 注謂「慶校眾本皆然。」李曰：「案『慶校眾本』，『慶』字當作『峻』。劉孝標本名峻，《梁書》、《南史》皆同。傳寫者因此書止題劉孝標注，不知其本名峻，遂妄改為慶，以為臨川自注語耳。史言孝標以字行，據此，則其自稱固仍本名也。各本皆誤。」余氏則據景宋本駁李氏之理校，謂：「作『慶』固非，作『峻』亦未安。惟宋本作『廣』，妙合語氣。『慶』與『廣』字形相近，因而致誤耳。」復引〈賢媛〉篇注「臣謂王廣名士」、〈汰侈〉篇注「臣按其相經」二語，以證孝標注乃奉敕之作，孝標實應自稱臣，而非己名。故《箋疏》末謂：「尊客先生未之思耳。」（頁 264）

〈言語〉31 載周顛曰：「風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異！」李氏引孫志祖說，以為《通鑑》作「舉目有江河之異」為佳，而以《晉書·王導傳》之「江山」為非。余氏案語則引敦煌唐寫本《殘類書·客遊篇》所引《世說》亦作「舉目有江山之異」，與《晉書》合，證唐人所見世說固作「江」，補李說考異之不及見者。（頁 102）

〈言語〉69 注引《晉陽秋》所載許詢生平始末，李氏引宋人高似孫《剡錄》為補說。余氏則細考《剡錄》兼敘高陽許詢、丹陽許玄二人之事。而李所引數語為許玄事，高似孫誤屬之許詢，故謂「知其所輯，不可盡據矣。」駁李氏考史之疏失。（頁 140）

〈文學〉1 之「轉式逐之」，李氏引《史記》、《周禮》、《漢書》證「式」為

<sup>40</sup> [清] 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頁 245。

<sup>41</sup> [清] 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頁 256。

<sup>42</sup> [清] 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頁 247。

<sup>43</sup> [清] 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頁 257。

<sup>44</sup> [清] 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頁 227。

<sup>45</sup> [清] 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頁 232。

<sup>46</sup> 張明：〈《世說新語箋疏》所載李慈銘批校校正（一）〉，頁 50-51。

「棧」，余氏則引桂馥《札樸》、《唐六典》補李氏之注。(頁 209-210)

〈雅量〉38 載王珉斥謝玄曰：「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！」李氏以為「碣」當作「羯」，玄之小名也。復云：「《世說》作『碣』。以『封』、『胡』推之，作『羯』為是。蓋取『胡』、『羯』字為小名，寓簡賤之意。如犬子、狗子、佛犬之類。古人小名皆此義也。此舉其小名，故曰『釣羯』。」《箋疏》則據《御覽》所引《語林》作「謝碣絕重其姊」，謂「羯、碣通用。」余氏又據《御覽》所載謝玄與其兄、婦書，考玄性好釣魚，故王珉「就其小字生義，詆為吳興溪中釣碣，言汝不過釣魚之羯奴耳。」引證完備，可糾李注之誤。(頁 209-210)

## (二) 余氏之駁議

《箋疏》於李氏之史評，批駁尤多，余氏之精擅考證，眾所周知，此不多贅，然就其《箋疏》中駁正李說之數十條觀之，余氏之考證方法實較李氏後出轉精、更趨邃密，爰舉數例余氏之正李說者論之：

### 1. 空言翻案

李氏雖長於考證，然《批校》中屢有以理校改字，空言翻案之例，甚則無端遷咎。此或受「批校」之體例影響。蓋批校本非「注」、「箋」、「疏」等嚴肅之學術專著可比，李氏雖以考訂史籍之態度治《世說》，然興之所至，往往飛筆縱橫，失之輕易，兼以褊急善詈之性，<sup>47</sup>故持論時流於偏激。余氏嘗於《目錄學發微》謂：

夫考證之學貴在征實，議論之言易於蹈空，證實則雖或謬誤，而有書可質，不難加以糾正。蹈空則虛驕恃氣，惟逞詞鋒。<sup>48</sup>

「虛驕恃氣」，不啻為李氏之藥石也。如前引〈任誕〉23 載阮籍聞母死而留棋決賭，臨葬母而飲酒烹豚事，李氏以為此乃元康八達之徒「妄誣先達」，並斥「鄧粲所紀，《世說》所販，深為害理，貽誤後人。有志名教者，亟當辭而闕之也。」余氏於阮籍固頗有微辭，然亦謂：「以空言翻案，吾所不取。籍之不顧名教如此，而不為清議所廢棄者，賴司馬昭保持之也。觀何曾事自見。」(頁 807) 又如〈任誕〉25 注引鄧粲《晉

<sup>47</sup> 李氏於當代名流、朝野重臣，乃至門生子弟，凡不喜者，皆於《日記》中極口謾罵。劉體智即謂其「於時人謾罵殊甚，……適成其為無忌憚之小人而已」，亦對其以偏概全式之批評一時、一處之人頗有微辭。詳參〔清〕劉體智著，劉篤齡點校：《異辭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 年），卷 3，第 226-228 條，頁 156-157。張桂麗：《李慈銘年譜·李慈銘綜論》，頁 393-404。

<sup>48</sup> 余嘉錫：《目錄學發微·古書通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），頁 62。章學誠曾於詠華佗的詩中盛推華佗忠義有奇謀，甚至有若借醫術除掉曹操，則孔明不必六出祁山，天下可歸漢之意。然余氏謂：「考之《後漢書》《三國志》本傳，並無其事，不知所出何書？觀其用青囊及剗頭事，乃知出於《三國演義》也……演義附會耳！……正坐天性善忘，讀正史不熟，又不耐考索，遂以模糊影響之談，形諸筆墨。」此亦為余氏重考據黜空言之旁證。詳參余嘉錫：〈書章實齋遺書後〉，《余嘉錫論學雜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），頁 617-618。

紀》載周顛當眾欲通紀瞻之妾，「露其醜穢，顏無忤色」云云，李氏評此事「或由王敦、王導之徒，銜其強直，造此詖辭。」<sup>49</sup>而余氏雖亦謂「伯仁名德，似不宜有此」，然棄引李氏此說，轉而上溯歷史背景，知「魏、晉之間，蔑棄禮法，放蕩無檢，似此者多矣」，故謂「伯仁大節無虧而言戲穢雜，蓋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」，而有「固不可以一眚掩其大德，亦不必曲為之辯」之通達見解。（頁 818-820）

## 2. 不審時勢

李氏持論，時有自後設立場品評人物，而未觀照歷史之時空背景，致為《箋疏》譏為「不審時勢」者。如〈言語〉101 載桓玄有篡逆之意，司馬道子乘醉以言語辱其父桓溫，是時主賓交窘，幸謝重出言轉圜，謂桓溫「黜昏暗，登聖明，功超伊、霍。紛紜之議，裁之聖鑒」，乃釋一時之緊張氛圍。注引檀道鸞論曰：「道子可謂易於由言，謝重能解紛紜矣。」然李氏認為「王、謝二族，世執晉柄，終懷顧己之私，莫發不臣之跡」，謝重甚則「動以廢昏立明，藉口歸功」，故斥道鸞之推謝重為「何其無識」。余氏則能代入當時情境，謂桓玄飛揚跋扈，包藏禍心，能早除之固善，然「道子昏庸，見不及此，本無殺之之意」，而竟乘酒使之羞憤難堪，「設竟激之生變，如庾亮之於蘇峻，小朝廷何堪再擾乎？」故余氏肯定謝重之言不過為「權詞解圍」，肯定其處置桓氏之方式「實具苦心」，並謂「道鸞就事立論，未為大失；尊客之評，藉端牽涉，竊所不取。」（頁 167-168）

## 3. 以今律古

上引〈品藻〉4 載時人以「蜀得其龍，吳得其虎，魏得其狗」分評諸葛亮、諸葛瑾、諸葛誕，而李氏以「狗」為貶詞，斥「司馬之黨，造此穢言，誣衊不經，深堪發指。」余氏則先由史實之邏輯，推論「司馬之黨必不以孔明為龍」，復以下文云「並有盛名」，明乎「狗」非鄙薄之稱，而「乃功狗之狗，謂如韓盧宋鵠之類。雖非龍虎之比，亦甚有功於人。」余氏亦引《六韜》為旁證，謂「太公六韜以文、武、龍、虎、豹、犬為次，知古人之視犬，僅下龍虎一等。」於末語帶鍼砭曰：「凡讀古書，須明古人詞例，不可以後世文義求之也。」（頁 558）

由以上三條觀之，余氏對李氏之駁議，在於反對其證據不足而欲翻案，復未能以回到歷史現場之態度評論古人，而有不審時勢、以今律古之弊，此皆立足於史學考據之視角，而未嘗質疑李氏抨擊阮籍等人所呈現之儒家本位及反玄立場。<sup>50</sup>

<sup>49</sup> [清] 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頁 262。

<sup>50</sup> 李氏之儒家本位及反玄立場，詳見後論。此處所用的「反玄」一詞，沿用江建俊所建構的內涵：「『反玄』即是反『虛玄』。反貴無、反流遁、反無君、反鈇巧、反偷惰、反隱逸、反偽僻、反權豪、反驕淫、反通達、反矜伐、反清談、反腐敗、反侈靡、反無為、反貪鄙，也就是反乘虛蹈空、反趨勢逐利、反沽名釣譽、反個體解放破壞群體……等，此屬『破』的方面；而標賢勝、貴名教、振禮樂、嚴節義、奉法紀、正人心、厚風俗、謹言行、端品性、修揖讓、惜節操、峻風格、愍世道、尊理性、料實才、進忠良、辨名實、稽中庸、勗習學、尚責任、厲朝儀、倡公謙、讚功業、任勞怨、弘經

#### 四、李慈銘評議魏晉時風之視角

如上述所舉，余氏於李氏之駁議，乃就治史方法及心態而言，至於李氏之學術本位，則未嘗有疑義也。余氏大量徵引《批校》史評之原由，實由二人之學術關懷及立場相近。由此進路考察，參以清末史料及李氏之《日記》、詩文集，可窺其評議魏晉時風之視角及背後之歷史因素。以下分三點述之：

##### （一）自任清流，嚴秉清議

同光之際，慈禧（1835-1908）與奕訢（1833-1898）爭權，各藉翰林院、都察院之言官御史彈劾政敵，由是遇事敢言，不畏強禦，以維護名教，臧否政要為己任之「清流黨」應運而生。<sup>51</sup>《清史稿》載：「是時吳大澂、陳寶琛好論時政，與寶廷、鄧承修輩號『清流黨』，而（張）佩綸尤以糾彈大臣著一時。」<sup>52</sup>又黃濬（1890-1937）亦謂：「光緒初，（陳寶琛）與張篔簹齋（佩綸）、寶竹坡（廷）、鄧鐵香（承修）號為四諫，以直言風節聲於天下，又與張孝達（之洞）、黃漱蘭（體芳）輩，號為『清流』。」<sup>53</sup>清流黨雖聲振於光緒朝，而清議之風則於清中葉以還已肇其端，如道光間之林則徐（1785-1850）雖事功顯赫，身居要位，而亦憂懼清議，不敢撻其鋒。<sup>54</sup>至李慈銘時，抗聲直諫之風氣，尤為士人群體所普遍景仰。如李氏房師林紹年（1845-1916），嘗因勸李氏改正「字殊欹斜」之習，而使李氏「退則大詬，遂久不通問」。然林紹年後「以直諫忤西后意，謫雲南昭通府，聲名動天下」，李氏乃「大嘆服，亟進謁，致慰餞，執弟子禮甚恭。」<sup>55</sup>楊國強分析此事謂：

略、重實驗，也就是兢兢業業，共獎王室，夙興夜寐以崇濟先典，扶明大業，有益於時為重，此屬『立』的方面。」參見江建俊：〈玄風中的反玄〉，收入氏著：《于有非有，于無非無——魏晉思想文化綜論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9年），頁381。

<sup>51</sup> 詳見趙慧峰：〈晚清清流與同光政局〉，《煙台師範學院學報（哲社版）》1996年第1期，頁41-46。王小華：〈晚清前清流探略〉，《重慶工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）》第22卷第2期（2008年2月），頁130-132。

<sup>52</sup> 〔清〕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·卷四百四十四·列傳二百三十一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），頁12455。

<sup>53</sup> 黃濬：《花隨人聖庵摭議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書店，1983年），頁47。「四諫」之成員，《清史稿》所載有異：「（黃）體芳、寶廷、（張）佩綸與張之洞，時稱翰林四諫，有大政事，必具疏論是非。」見〔清〕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·卷四百四十四·列傳二百三十一》，頁12460。陳寶琛有「同時四諫接踵起，欲挽清渭澄濁涇」之詩句，自注則謂：「時稱張、寶、何、王，文襄（之洞）尚未在講職也。」見〔清〕陳寶琛著，劉永翔、許全勝校點：《滄趣樓詩文集·吳柳堂御史圍爐話別圖為仲昭題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上冊，頁167。諸家名目雖有出入，綜而觀之，「清流黨」之主要人物則盡在茲矣。不過，近來也有學者指出，無論被視作「清流」領袖之翁同龢、李鴻藻，抑或被譽為「清流」中堅之張之洞、張佩綸、寶廷等人，皆不認同亦不願自居「清流」、「清議」之名，以避結黨之嫌，可知張之洞等人未必有意組織政治集團或派別，且所謂「清流黨」內部成員亦存在頗多政見分歧，並未具備政黨之條件，故「清流」僅能視為一種政治現象。參見王維江：《「清流」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10-11、38-41。

<sup>54</sup> 蔣廷黻即指林則徐雖深諳中外形勢，知英人火器之精，「剿夷」實非長策，然懼於清議之「討伐」，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」，故未敢公開提倡改革。見蔣廷黻：《中國近代史大綱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17-18。

<sup>55</sup> 黃濬：《花隨人聖庵摭議》，頁113。

「直諫」已在天下注目中體現了儒家賦予士人的群類道義和群類責任。林紹年以承擔道義和責任受貶謫，因此，林紹年與每一個士人都有了關係。李慈銘的「大嘆服」，正是沿著這種關係表達出來的一個士人對另一個士人的敬意。而由「大詬」到「大嘆服」，則又具體地演示了個人對個人的私意，是怎樣被士人對士人的敬意所融化的。<sup>56</sup>

而廟堂之清流，以士大夫的清議為源頭，故學者歸納晚清之清流人物，往往朝野並兼，而李慈銘亦名登其列。<sup>57</sup> 此乃研究李氏評議魏晉風氣視角之重要歷史背景。

自洪楊太平天國之亂後，江浙文化繁榮之地遭重創，益使綱紀不振，李慈銘嘆曰：「越中亂後，典型無存，士習囂陵，風俗日壞。」<sup>58</sup>風俗之壞，可見於底層官員之奢靡貪污：

鄉曲近事，亂離甫定，紳士驕橫，守令不才，猾胥益熾，奢淫相尚，告密成風，脂膏竭於釐捐，衣冠自相魚肉，風俗之壞，百倍於前。<sup>59</sup>

流風所被，即京師首善之地，官員亦墮落腐化，<sup>60</sup>李氏憤慨莫名，於《日記》大書特書，並於眉批謂：「此等中人醜穢事，本不屑汗吾筆，欲示後人以京師風氣掃地至此，予之憤時嫉俗，固出於不得已也。」<sup>61</sup>而李氏少即誦明末大儒劉宗周（1678-1645）之書，「以嚴辨義利為處世之要」、「尤以激揚名教，嫉遠邪佞為己任」，雖因此得罪友朋貴要，而跡其本心，則欲「整齊物類，申明典章，以尊朝廷而清風俗，其次亦欲自效一隅，以禮義廉恥振飭人心，使其日漸於教化」耳。<sup>62</sup>李氏上官長書曰：

雖貧悴冗散，眾謗羣疑，而以身屹立于波靡之中，扶植名教，激揚廉恥，竊

<sup>56</sup> 楊國強：〈晚清的清流與名士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晚清的士人與世相》增訂本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7年），頁148-149。

<sup>57</sup> 楊國強調：「《清史稿》羅舉了為清流先開風氣的一群人，而在時人的論述和後人的追述中，可以同他們歸入一類的，至少還有……李慈銘……等等。」見楊國強：〈晚清的清流與名士〉，頁154。

<sup>58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與馬穀山中丞箋（乙丑十月）》，下冊，頁1151。

<sup>59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孟學齋日記·乙集上》，第5冊，頁3207-3208。

<sup>60</sup> 如清人筆記即載：「同光之間，粵捻匪初平，四海晏安，百姓康樂，京師士大夫頗喜講車馬衣服，一時囿於風氣，雖賢者亦不能免。」見〔清〕劉聲木：《菴楚齋隨筆·續筆·三筆·四筆·五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），上冊，頁555-556。同治間官員於口腹之慾，亦漸趨奢侈：「飲饌一項，道光間風俗尚樸素，酒席無新花樣。咸豐間，以各省用兵戡亂，京師士大夫多戒繁華，且不暇講求飲食之屬。至同治中，髮、捻平後，人心乃定，宴會酒席中食品多者至五十餘種。」見〔清〕崇彝：《道咸以來朝野雜記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59。

<sup>61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苟學齋日記·後甲集之上》，第17冊，頁12187-12188。

<sup>62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上閩丹初尚書書》，中冊，頁833。

冀自附於大過獨立不懼之君子，而上為朝廷裨助風化之百一，往往於義利之觀，邪正之辨，大聲疾呼。風雨如晦，誠知其愚。區區之心，不能已也。<sup>63</sup>

壯志凌然，言辭懇切，雖以後人角度觀之，固難免膚廓大言之譏，而於此求李氏之人生價值取向，則庶幾不遠。李氏所念茲在茲者，在「嚴辨義利」、「扶植名教，激揚廉恥」、「助風化」、「邪正之辨」，除可覘其思想中之宋學影子，更不能忽略其欲以學術經世之心態。《日記》中此段自抒心曲，可為明證：

余性雖褊急，……平生酬接，未嘗以一語傷人，雅俗相參，絕口不及學問，偶遇名流，道古雖陋妄百出，從不出一言正之，以露才揚己為深戒，以情遺理恕為至言，非惟取法先賢，實亦秉承家教。或酒間縱論，花下閒評，偶及時事是非，人材臧否，無不平情審度，公道主持。即日記之所書，本私家之自述，冀存清議，稍秉嚴科，然一字之加，三思而出，必衡其終始，權其重輕，幽可以質鬼神，明可以視天日。學問有片長無不暴之，心術有可諒無不原之。而私衷所寓，又有三例：交好有小過者諱之、微賤有大惡者略之、過惡雖著而不係人心世道者亦沒之。至己有小失，無不大書，所以示名教，存大閑也。世無知我者，聊於此發之。<sup>64</sup>

李氏雖孜孜於科舉，然仕途偃蹇，至老僅任御史，從政之時寡，賦閑之日多，不得不潛心學術。其經世之志，在以日記之私家著述，於時政人事，嚴秉清議，於己之過則「無不大書」，是直以其《日記》為清季之月旦評矣。<sup>65</sup>所謂「時事是非，人材臧否」，於《日記》中在在而見，如抨擊京城米價之高昂，而「大小恬熙，惟知賣弄國權，奔競捷徑，有暇則逐酒食聲伎，盜賊劫掠，白晝公行，嚴詔督捕，漠不為意。」<sup>66</sup>甚至怒斥清流黨中之張之洞（1837-1909）為「僉人」，指其貪縱驕恣，虧公帑至千萬。<sup>67</sup>李氏以好罵聞名，此中固有個性使然，實亦蘊含李氏欲以狷介矯世之衷。蓋清季世風柔靡，人多以「謹厚」、「廉靜」、「退讓」為美，實則假此三者之名以行鄉曲阿世之實。<sup>68</sup>而朝廷群臣之緘默懼事，嘉道時人管同（1780-1831）已有所揭示，管氏以

<sup>63</sup> [清]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復陳晝卿觀察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中冊，頁827。

<sup>64</sup> [清]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桃花聖解齋日記·庚集第二集》，第11冊，頁7586-7587。

<sup>65</sup> 吳振芝分析其日記內容，以談論國事、臧否時政者最多。詳參氏著：〈李慈銘先生之人格與風格〉，收入朱傳譽編：《李慈銘傳記資料》（臺北：天一出版社，1979年），頁10-12。詳參查時傑：《從〈越縵堂日記〉看晚清的清議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，1964年）。

<sup>66</sup> [清]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桃花聖解齋日記·庚集第二集》，第11冊，頁7597。

<sup>67</sup> [清]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孟學齋日記·甲集下》，第5冊，頁3067。

<sup>68</sup> 參見嚴壽澂引道光御史朱琦之〈名實說〉。嚴壽澂：〈道光朝士風與學術轉向——讀沈垚《落帆樓文集》〉，收入氏著：《近世中國學術思想抉隱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216-217。

為明代因聚徒講學、言官爭競而造成的官橫士驕之風，為清廷所矯正，然亦造成閣部督撫不過奉行詔令、給事御史不得大有論列之後果，乃至近百數十年間，天下多事，而朝堂學校之間則悄然無聲。管氏進而抨擊清廷：

大臣無權，而率以畏懦；臺諫不爭，而習為緘默；門戶之禍，不作於時，而天下遂不言學問；清議之持，無聞於下，而務科第，營貨財，節義經綸之事，漠然無與於其身。<sup>69</sup>

公卿大夫之依違無定，不敢進諫直言，最顯明之例莫如道光間首席軍機大臣、武英殿大學士，死後諡「文正」之曹振鏞（1755-1835）。曹氏晚年身名俱泰，門生請問其故，曹氏竟答以「無他，但多磕頭，少說話耳。」<sup>70</sup>宜乎後人總結「道光以來，世風柔靡，實本於此，近更加以浮華，稍質直即不容矣。」<sup>71</sup>在上位者念茲在茲者，全在保有一己之私利，流風影響所及，則往往出自民間士人之清議亦闐然無聞。嚴壽澂嘗援民初學者劉咸炘（1897-1932）論「士風」時所區別之「甲風」、「乙風」討論道光士風。概而言之，「甲風」偏於柔靜，寬裕而失為依阿，慎定而失為拘憊，至尋常而不足應變；「乙風」偏於剛動，高峻而失為迂褊，發強而失為躁詭，能興作而每致僨事。

「甲風」平世所成，而「乙風」多見於亂世。<sup>72</sup>約而論之，則李慈銘所處時代氛圍，顯然偏於「甲風」，故李氏日記中強調之「助風化」、「激揚廉恥」，或亦有意藉助鼓暢「乙風」以矯正之。於時名列「清流四議」之寶廷即謂：「時政至寬，當救以嚴」<sup>73</sup>，或亦與李氏「稍秉嚴科」之心態相近。

此外，李氏於兩漢之清議論風尚尤傾心，就後人由其《日記》所輯之《越縵堂讀書記全編》考之，《漢書》有 24 條，《後漢書》有 18 條，為全書佔比甚重者，雖各條內容多涉文字及史實之考訂，不盡為史評，但從此亦可覘知李氏對兩漢史事之研究熱忱。<sup>74</sup>其自許「為國家振舉文治，與兩漢同風。即授白簡冠執法，亦能奮不顧忌，侃侃論執，有裨大計，為古諫臣。」<sup>75</sup>李氏既以古諫臣為人格標準，宜乎其平日喜讀《漢書》李膺、范滂等傳，以此文能「推明儒術氣節之足以維持天下」也。<sup>76</sup>於《後

<sup>69</sup> [清]管同：《因寄軒文初集·擬言風俗書》，收入嚴雲緞等主編：《桐城派名家文集》第 5 卷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4 年），頁 31。

<sup>70</sup> [清]朱克敬：《瞑庵雜識·瞑庵二識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83 年），頁 119。

<sup>71</sup> 同前注。

<sup>72</sup> 嚴壽澂：〈道光朝士風與學術轉向——讀沈垚《落帆樓文集》〉，頁 207-209。

<sup>73</sup> [清]朱壽朋編，張靜廬等校點：《光緒朝東華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 年），第 1 冊，總頁 686。

<sup>74</sup> [清]李慈銘著，張桂麗輯校：《越縵堂讀書記全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21 年），第 5 冊，頁 2313-2314。

<sup>75</sup> [清]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己集》，第 2 冊，頁 1059。

<sup>76</sup> 李氏曰：「僕少懷慷慨，長際時艱。累草賈生之書，常讀范滂之傳。」[清]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四十自序》，下冊，頁 1155。又曰：「自漢以後，蔚宗最為良史，刪繁舉要，多得其宜。其論贊剖別賢否，指陳得失，皆有特見，遠過馬、班、陳壽，餘不足論矣。予尤愛



漢書》，亦謂其佳處在「崇經學，扶名教，進處士，振清議，聞之者興起，讀之者感慕。」<sup>77</sup>李氏詩文中亦引兩漢士人之節操自勉，如〈冬夜讀後漢書李固杜喬傳〉云：

二公志違天，豈計死扞難。危言留信史，寸心與不爛。鬼神共迴薄，金石立可貫……吾心出光明，短檠一燈斂。奇節在天地，讀書兆憂患。名士固不祥，慘惻迫世亂，殺身以成仁，卑末無自見。<sup>78</sup>

相對於崇尚兩漢之情，魏晉之篡逆謀叛成風，則為李慈銘所大力批判者，並將此現象歸罪於曹操之「崇尚權詐」，造成「流品不立」、「立國基淺，而禮教不興」、「風教陵遲，人不知有禮義」，進而使得「世臣華胄，人有問鼎之心」。<sup>79</sup>此論調或受晉人傅玄著名的說法所影響：「近者魏武好法術，而天下貴刑名；魏文慕通達，而天下賤守節。其後綱維不攝，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，使天下無復清議，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。」<sup>80</sup>值得留意者，在李慈銘雖於魏晉整體之風尚多表否定，認為其時「尚風流而忘名節，君臣大義，多不復知」，然獨稱許晉人之「私家禮法猶嚴，清議猶峻，非後來之所及也」<sup>81</sup>，持論與傅玄異，姑不論二者孰是孰非，李氏對「清議」此一議題當有特別之關注及研究，可見振清議、崇氣節二事，乃李慈銘論學評史之重要價值取向。

## （二）政學掛鉤，詳判刑名

李氏不僅以兩漢重清議、氣節之士風自勉，亦以此律人，其於當代朝野之士，皆以高標準檢視、批判之：「比來京師所見學士大夫，荒陋尤甚，益痛世運陵遲，斯文墜地，愈不自揆，欲以區區一簣障塞橫流。」<sup>82</sup>尤於士大夫之不學無術，有害世道，極為重視，故於《日記》中引《三國志·王肅傳》注所引《魏略·儒宗傳序》：「正始中有詔議園丘，普延學士。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見在京師者萬人，而應書與議者，略無幾人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，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」，而後大發議論：

嗟夫，學業沈隕，乃至于此！其言可為絕痛。蓋魏之三祖，崇尚文辭，遂成風

---

者，其中如〈儒林傳論〉、〈左雄周舉黃瓊黃琬傳論〉、〈陳蕃傳論〉、〈黨錮傳序〉、〈李膺范滂傳論〉、〈竇武何進傳論〉，皆推明儒氣節之足以維持天下，可歌可泣，令人百讀不厭。」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補·辛集上》，第3冊，頁1850。

<sup>77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孟學齋日記·丙集》，第5冊，頁3637。

<sup>78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冬夜讀後漢書李固杜喬傳》，上冊，頁76。

<sup>79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息茶庵日記》，第6冊，頁4414。李氏早年持論則有異，認為「昔人謂六朝風氣極敝，然有後世所不可及者，如嚴流品，重家諱等數端是也。……自晉過江後，世家固皆有風慨。」見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丁集》，第1冊，頁601。

<sup>80</sup> 〔唐〕房玄齡等撰：《晉書·列傳第十七·傅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卷47，頁1317-1318。

<sup>81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桃花聖解庵日記·乙集第二集》，第9冊，頁6698。

<sup>82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與顧河之孝廉書》，中冊，頁819。

俗。故〈高堂隆傳〉言自隆與蘇林、秦靜卒後，學者遂廢，至于正始而何平叔誅，甘露而鄭小同醜，高貴鄉公勵精好學，間世一出，而所餘王沈、王業、司馬孚、鍾會等，皆人奴國賊，無足與言，發憤鋤凶，轉嬰酷變，而魏遂不可為矣。國之將亡，學殖先落。<sup>83</sup>

「國之將亡，學殖先落」一語，可謂為李氏評議魏晉風氣時，重實學而反清談之主要原因。其於文集中一再強調民風敗壞之始，皆由於士大夫之崇文廢學，不守名節，如道光年間有主事者以科甲與地方官為市，而鼓扇浮薄，相為聲勢。由是下層官員紛紛踵而效之，李氏痛斥為「名檢蕩然，士無矜式」、「以秀孝為羔雁，以貲級為梯媒」，而郡縣中之設館授徒者，復多枵腹之輩，「時文之外，一無所知」，故李氏對此嘆曰：「尚何能以名節相繩，實學為教乎？」<sup>84</sup>因此，其於乾嘉漢學如日中天之時代極為嚮往，以清中葉時期經學大盛，「邪說」不起，而中國之所以不為「夷」所變者，李氏亦導其因於此：

國家之所以不亡，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為夷者，正以高宗皇帝昌明正學，大闡群經，士子服教畏神，弦誦侷侷，老死相守，故一切新奇曼衍、荒唐杳冥之說，不能偏浹於人心。而世之妄人，尚謂近日之亂，由漢學太盛、不講心性之故。何其愚而無忌憚哉！君子追原禍始，王、何之辜，浮於桀、紂，雖舉宋以後語錄諸書，盡投之烈火可也。<sup>85</sup>

此段日記寫於同治八年，而李氏於同治十三年完稿之《批校》，則於范寧以何、王罪深桀紂之論予以反駁：

范武子以清談禍始，歸罪王、何，謂其浮於桀、紂。予謂漢末之五荀、五陳，實任達之濫觴，浮華之作俑，觀其父子兄弟，自相標榜，坐致虛聲，託名高節，太丘弔張讓之母，朱子謂其風節始積；其後，羣附曹氏，太黨司馬；荀氏則爽為卓用，或成操篡，顛、勛以還，名教埽地，桀紂之禍，自有所歸。輔嗣名通，平叔正直，所不受也。（頁 248）

惟李氏雖為何、王脫罪，其批判清談之宗旨仍與范氏無殊，「桀紂之禍，自有所歸」，但歸咎之對象，上移至漢末之五荀五陳而已。《世說·企羨》6 載王恭「乘高輿，被鶴氅裘」，孟昶嘆為「神仙中人」，本就人物形神之美下筆，李氏則藉機指斥王恭「學術

<sup>83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桃花聖解庵日記·辛集》，第 8 冊，頁 5974-5975。

<sup>84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復陳晝卿觀察書》，中冊，頁 828。

<sup>85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息茶庵日記》，第 6 冊，頁 4378-4379。

全無，驕淫自恣」，而「首創亂謀，妄清君側」，復「昧於擇將，還以自焚」，於末更以王恭為晉室既屋之罪首，「當時歎為名士，後世載其風流，六代陵遲，職由於此」（頁 253），李氏以學政相掛鉤之視角、衛護名教之心態，於此可見。<sup>86</sup>

復次，李氏早年自謂「生平所最注意者，《正名》二十篇，頗自負為內聖外王之學，足以繼《明夷待訪錄》、《日知錄》而起，須俟身後始出之耳。」<sup>87</sup>「正名」乃《荀子》之篇名。張桂麗謂：

李慈銘晚年確專心於《荀子》研究，曾作注，後又作此《正名》二十篇之多，且將書齋命名「荀學齋」，自稱「荀學老人」。這部自詡為傳世之作今未見傳，也未見於各家著錄。<sup>88</sup>

其書雖佚，然由篇名及與荀學之關聯推測，蓋與刑名之學相關，而刑名之學「大抵以名辯方法考察名實關係，作為推行正名與循名核實政治的張本。」<sup>89</sup>重視「循名責實」之心態，使李氏批校《世說》，每疾晉人之浮虛標榜，有名無實。如：

晉、宋、六朝膏粱門第，父譽其子，兄夸其弟，以為聲價；其為子弟者，則務鄙薄父兄，以示通率；交相偽扇，不顧人倫。世人無識，沿流波詭，從而稱之。（頁 247）

此條是六朝人矜其門第之常語耳，所謂專以冢中枯骨驕人者也，臨川列之〈賞譽〉，謬矣。（頁 247）

李慈銘既於清季有人材匱乏之評斷，亦以晉室為反思借鑑之負面代表，其謂「人才莫衰於晉」，並視荀顛、荀勗、賈充為「人奴」；以王祥、李熹等為「浮沉無恥，庸鄙取容」。甚至斥王、謝、殷、庾等世家大族為「驕戾很（狠）戾，絕無才能。」李氏讚許之晉代臣子僅有二十人：

<sup>86</sup> 余嘉錫雖同居儒家立場，維護名教，於李氏此評則大不以為然，《箋疏》謂：「矜飾容止，固是南朝士大夫一病。然名士風流，儀形雋美者，自易為人所企羨，此亦常情。《晉書·王恭傳》載此事云：「恭美姿儀，人多愛悅，或目之云『濯濯如春月柳。』嘗被鶴氅裘，涉雪而行。孟昶窺見之，歎曰：『此真神仙中人也！』」然則昶之贊恭，乃美其姿容，非第羨其高輿鶴氅裘而已。尊客乃鄙昶為寒人，詆為奴顏乞相，不知本書所載，若此者多矣！即如上篇王長史於積雪中著公服入尚書，王敬和歎為不復似世中人，此與昶之贊恭何異？敬和宰相之子，豈亦寒人奴顏乞相耶？尊客此評，深為無謂。」余嘉錫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頁 700-701。

<sup>87</sup> [清]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復陳晝卿觀察書（丁亥十一月）》，下冊，頁 1149。

<sup>88</sup> 張桂麗：《李慈銘年譜·附錄二》，頁 449。

<sup>89</sup> 唐長孺：〈論魏晉時期的變化〉，收入氏著：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 年），頁 66。

羊祜之厚重，杜預之練習，劉毅之勁直，王濬之武銳，劉弘之識量，江統之志操，周處之忠挺，周訪之果勇，卞壺之風檢，陶侃之幹局，溫嶠之智節，祖逖之忼慨，郭璞之博奧，賀循之儒素，劉超之貞烈，蔡謨之檢正，謝安之器度，王坦之之風格，孔愉之清正，王羲之之高簡，皆庸中佼佼，足稱晉世第一流者，蓋二十人盡之矣。<sup>90</sup>

此全從道德風節、學問事功之角度品評人才，故二十人中大抵皆有斐然之政績、戰勳，即如劉毅、江統、郭璞、賀循等較少事功者，亦俱有抗直忠悃之德。卞壺、王坦之為著名之反玄之士，王羲之亦有「虛談廢務，浮文妨要，恐非當今所宜」之語（《世說·言語》70）。而餘輩之有異才或特殊人格者，則一概在李氏摒斥之列：

七賢八達無論矣，若王湛之風流，劉惔之簡貴，雅稱領袖，未有殊能。衛玠杜乂之倫，人物雖佳，何與人事？劉疇、韓伯、王濛、殷融，雅俗所宗，寂乎無述。而王濟之傲縱，王澄之狂暴，殷浩之虛闇，謝萬之佻率，郝超之奸諂，王忱之輕狠（狠），皆亂世無賴，蠹國敗家，而士類相矜，以為標準。……史家無識，莫究其誣，誇六代之多才，貽千古之笑柄，晉之不競，良可識矣！<sup>91</sup>

上述諸人，除王濟以下外，或妙於言語，或精於學術，或人格清雅、或個性獨特，而李氏因純從實務之角度評判，無法體會魏晉人物風神之美，故有「人物雖佳，何與人事」之質疑。由此可知，李氏之重學問，亦以事功實務為最終導向，故於史書誇六代多才之論，遂柄鑿不入。不知魏晉所重之才，本不拘於實用性質也。李氏自謂喜讀乾嘉諸儒之撰述，以日盡一寸書為度，「或據案別錄，或仰屋梁思其疑義，頗亦有所論列。此外，唯咄咄歎咤而已」，而視其友之「痛飲酒，熟讀《離騷經》為名士者」（典出《世說·任誕》53），自謂「又有苦樂之間，孰得孰失，不必辨也。」<sup>92</sup>可知李氏明確自劃於名士之外，亦承認其無法體會名士之樂。其所訴求之理想人格，乃乾嘉時期孳孳矻矻守經之儒。而此實隱含學術以外之經世期待，即試圖以儒家之學術及道德標準，導正道咸以降，迭經內憂外患而瀕臨崩潰之社會秩序，而其理想之願景，則是以古文經學為學術主流，「異端邪說」未蠶起並作之乾嘉時代。<sup>93</sup>正如蔡長林所言：

<sup>90</sup> [清]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息茶庵日記》，第6冊，頁4415-4416。李氏早年稱許為晉代第一流人物的尚有桓溫，見[清]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丙集傳錄本》，第1冊，頁496。

<sup>91</sup> [清]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息茶庵日記》，第6冊，頁4416-4417。

<sup>92</sup> 李慈銘雖不喜多數六朝人物之言行思想，而其行文則頗有六朝影子，即如此信用詞亦多脫化自魏晉習語，如「意興頹賁，不能作劇談」、「共參名理，非可虛作閑寫」、「胸懷作惡，風味轉墜」，典出《世說·傷逝》17。故李氏對魏晉文化之接受，並非全盤否定。詳見[清]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·致陳德甫書》，中冊，頁821。

<sup>93</sup> 王標即謂：「李慈銘試圖用理想的學術價值和道德價值來恢復的知識秩序、儒教秩序，充其量只是恢復到道咸以前乾嘉漢學古文經學的時代，和太平天國動亂之前的康乾盛世，是經學黃金時代的秩序

他的乾嘉情懷，絕非僅僅落實在追求客觀化與去道德化這一做學問的方法學層次上。更具有鮮明色彩的，是他的乾嘉情懷，是他用以衡量學術、政治、文章、風俗人心乃至整個人文傳統美惡之標準。<sup>94</sup>

故其對乾嘉學術之接受，除學術方法論外，尚有更進一層之道德價值，故蔡氏亦謂：「李慈銘對乾嘉學術最根本的訴求，更傾向在道德化這一層次上。」<sup>95</sup>而此種對道德價值追求之具體表現，可見於其評驚魏晉「忠孝」觀。

### （三）整飭人倫，忠孝並重

李慈銘生當道光年間，時值漢宋學易勢之際，程朱義理之學寢假復興，<sup>96</sup>經世之風起於士林，<sup>97</sup>故李氏雖學宗漢學，而亦未菲薄宋儒，蓋尊宋儒轉移社會風氣之功也：「自程朱生後，天下氣象，為之一變。束髮之儒，恥事兩姓；曳柴之女，羞醮二夫，尤其明效大驗。」<sup>98</sup>故其嘗謂「欲學漢儒之治經，當先學宋儒之治心。」<sup>99</sup>宋儒特重踐履，而李氏作為儒者，除研讀儒家經典外，一生持之彌堅者，尤在踐行孝道。其十五歲失怙，三十六歲喪母，故唯能藉助祭祀之方式表現孝道。據其《日記》所載，李氏幾乎每週一祭，甚至將同治五年十一月至同治七年十月兩年間之日記命名為《受禮廬日記》，且自同治十二年以後，每逢其亡母忌日（八月十七日），必讀《孝經》兩

---

和天朝中心的秩序。」詳參王標：〈作為文化實踐的讀書——以李慈銘《越縵堂日記》為中心〉，《杭州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7年第4期，頁20。

<sup>94</sup> 蔡長林：〈長日將盡，典型宿昔——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乾嘉情懷及其意義〉，《人文中國學報》第20期（2014年9月），頁117-118。

<sup>95</sup> 蔡長林：〈長日將盡，典型宿昔——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乾嘉情懷及其意義〉，頁115。盧敦基亦謂：「李慈銘對學術的思考不如乾嘉時期漢學家那麼深入，不能在堅持客觀性的同時思考去道德化的問題。」二人視角不同，然皆指出李氏對穩定社會秩序之道德價值之追求。詳參盧敦基：《李慈銘研究》，頁80。

<sup>96</sup> 清中晚期學術思潮消長之大勢，為考據之學退，而義理之學興，學界已有定論，詳參劉師培：〈近儒學術統系論〉，收入朱維錚編：《劉師培辛亥前文選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8年），頁162。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·曾滌生》（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19年），頁454。史革新：《晚清理學研究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100-116。〔美〕艾爾曼著，趙剛譯：《從理學到樸學：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168-172。王汎森更進一步以方東樹《漢學商兌》之出版為清代學術思想由漢轉宋之轉捩點：「《漢學商兌》一書在1830年代的影響還不算大，……漢學到晚清還未衰歇，而且在民國學術史中仍佔一關鍵地位。不過，我們可以說它打破了漢學一元壟斷的局面。此後漢學並未馬上衰微，但是它的獨佔性漸成過去。」李慈銘生於1830年，正值此漢學衰退，宋學上漲時期。詳參王汎森：〈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〉，收入氏著：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（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3年），頁20-21。

<sup>97</sup> 彭明輝即以「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」之說解釋晚清史學之特色，以此論晚清整體學術思想，似亦可通。參見彭明輝：《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5年），頁354-359。

<sup>98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孟學齋日記·甲集·首集下》，第4冊，頁2602。

<sup>99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桃花聖解齋日記·甲集第二集》，第9冊，頁6463。

遍：100

夜黃昏時，讀《孝經》再過，方素食，以先妣忌時也。此事去年始行之，自後遇今日，若非甚疾病者，當終身以為常。<sup>101</sup>

而前引李氏批校《世說·任誕》第9條調：「父母之喪，苟非禽獸，無不變動失據。……嗣宗晦跡尚通，或者居喪不能守禮，何至聞母死而留棊決賭，臨葬母而飲酒烹豚，天地不容，古所未有。……鄧粲所紀，《世說》所取，深為害理，貽誤後人，有志名教者，亟當辭而闢之也。」<sup>102</sup>其抨擊阮籍之悖禮，與此條日記相參，益突顯出李氏重孝守禮之立場。其校畢《世說》同時期所撰之日記，於魏晉「忠孝」觀亦頗有深論，如對嵇紹、王裒之看法，即與《晉書》有異：

嵇紹與王裒不可同年語也，裒父儀雖為司馬昭所殺，然裒（儀）本昭之司馬，因軍敗不自請罪，而反歸罪於昭，因以致死，非不順昭者也。裒本可以仕而不肯仕，所以為孝也。紹父康則以不黨司馬氏而死，紹之所處，當與諸葛靚同，觀靚之事，則紹必不可為晉臣矣。山濤勸紹以仕，此竹林之積風，清談之結習也，紹幸以一死概之，既仕則宜死也。《晉書》以裒入〈孝友〉，以紹入〈忠義〉，而論中以兩人並衡，謂趣異而理同，又引《左傳》『天可讎乎之言』，非也。守父之志而不仕，安得謂之讎乎？<sup>103</sup>

《晉書》以王裒獨善其身而全孝道；嵇紹兼濟於物而宜竭其忠，二者乃「蘭桂異質而齊芳，《韶》《武》殊音而並美」，而或有譏諷嵇紹之死難晉室者，《晉書》則以為君者「天也，天可仇乎！」暗示推忠先孝之義。<sup>104</sup>李氏則以為二人之背景不同，當分別論之，王裒父王儀之死，其因非不順乎司馬氏，故王裒與朝廷無怨，若出仕奉晉，於道德層面上並無瑕疵，而其選擇不仕，益見其孝心；嵇康則以不黨於司馬氏而見誅，死非其罪，是晉室於嵇紹有不共戴天之殺父之仇，理應守父之志而不仕，此並非報仇之行動，故李慈銘以「天可仇乎」一語為無徵。唐修《晉書》隱隱以忠君為第一義，李氏則並重孝道。

然李氏亦鄙夷魏晉時孝子不忠之行，如謂：「王祥、何曾、荀顗皆稱至孝，而皆不忠於魏；……祥與延皆為後母所虐，皆有盛冬求魚于冰上之事，而延能死劉氏斬準之

<sup>100</sup> 王標：〈作為文化實踐的讀書——以李慈銘《越縵堂日記》為中心〉，頁19。

<sup>101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·桃花聖解齋日記·癸集》，第9冊，頁6241。

<sup>102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頁261。

<sup>103</sup> 〔清〕李慈銘撰，由雲龍輯：《越縵堂讀書記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270。

<sup>104</sup> 〔唐〕房玄齡等撰：《晉書·列傳第五十九·忠義》，卷89，頁2323。

難，效子胥抉目之言，較之休徵，加一等矣。」<sup>105</sup>可知其雖崇孝道，然亦不以君道為後。而李氏看待忠君仍屬後設視角，未能導入魏晉客觀歷史背景之情境論略之。江建俊謂：「蓋唐以前，本不以貳臣為深恥也。」<sup>106</sup>復指出：「魏晉君權之式微，坐受廢辱之事，層出不窮，……君權之式微，則『忠』的觀念也跟著淡薄。」<sup>107</sup>二人「忠孝並重」之持論，近於魏晉反玄之士之為光大門風，以「孝」為出發點，為達「孝」而延伸於「忠」。而與魏晉主流為避禍遠害，而以孝為本，以忠為末之取徑則有背離：

儒家以「孝」為一切德行之本，而孝本柔愛，還得有禮敬之心，推之，則為忠。劉邵之主愛為敬之本，愛當多於敬；此與何、王之主名教當本之自然，甚或嵇康之高喊「越名教而任自然」，使孝為本、忠為末的主張遂有跡可尋，宜其魏晉士人之崇尚孝也。由崇尚孝，孝先於忠，是「私」先於「公」，「情」重於「禮」也。而緣「孝」先於「忠」，「情」重於「禮」，「內」重於「外」，則凡「孝」名一出，每可掩蓋「公忠」之瑕疵，此何曾輩之得以偷苟，而士風之所以不競也。<sup>108</sup>

李氏以大一統時代之中央集權制為標準，檢視魏晉之忠君概念，與其身為「清流」中人，亦不無關係，蓋咸同年間，內戰更迭，清廷權利逐漸下移至封疆大吏，而清流人物欲正綱紀，則為彼時「中國最自覺地懷抱尊王意識的人」，以與大吏之尾大不掉相抗，<sup>109</sup>故未能就事論事，思及當時政制、風氣之外在影響，然此後設之視角，亦不啻為研治晚清「世說學」之其中一項獨特之觀察點也。

## 五、結論

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之著述主旨，在藉史事之發覆以彰善癉惡，借古喻今，砥礪士節，明辨是非，有以學術經世之苦心孤詣。此書所徵引之清末民初「世說學」論著中，除程炎震外，以李慈銘之《世說新語批校》最多。《批校》之內容，可分為「校」、「注」、「考」、「評」四大類，而以「評」類最有學術價值。李氏總共 272 條批校中，余氏采其 244 條，於「評」類文獻全錄，可見其於李氏意見之重視。然《箋疏》於引用李說之後，往往有駁正附案。考其駁議內容，皆聚焦於治史之方法及心態問題，如「空言翻案」、「不審時勢」、「以今律古」，而於其史觀及史評之立場，則未嘗有疑義也。蓋李慈銘亦以儒家思想為體，學術經世為用，與余嘉錫若合符節。李慈銘

<sup>105</sup> [清]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頁 261。

<sup>106</sup> 江建俊：〈魏晉「忠孝」辨〉，收入氏著：《于有非有，于無非無：魏晉思想文化綜論》，頁 367。

<sup>107</sup> 江建俊：〈魏晉「忠孝」辨〉，頁 368。

<sup>108</sup> 江建俊：〈魏晉「忠孝」辨〉，頁 370。

<sup>109</sup> 楊國強：〈晚清的清流與名士〉，頁 159。

檢視魏晉思潮與風氣之視角，與其歷史背景息息相關。李氏生逢亂世，而身為一介文臣，唯能以學術經世、藉清議論政，以此心態投射於評議魏晉人物時，不知覺間便以道德之修養為首要標準，此具體呈現於其對「忠孝」之討論。李氏忠孝並重，持論與魏晉主流之「孝先忠後」與唐修《晉書》呈現之「君先父後」論皆有出入，蓋純以後設視角為立論之基，而未能就事論事，思及當時政制、風氣之外在影響。除此之外，李氏既重經世，品評人才之標的，惟局限於治國安邦之才，而未能理解魏晉對「才性」之多元詮釋及內涵，故其所稱許之魏晉人物僅二十人，且多具政治、軍事之事功，於其餘清談、學術之人物，則莫從欣賞。李慈銘於魏晉思想之評議，學界多聚焦於其《批校》有限之篇幅，而本文則兼采其詩文集、日記之內容，並以「清議清談」、「政學掛鉤」、「忠孝並重」三大主要議題為述介之重心，俾使其思想有更完整之呈現，而非僅聚焦於《世說》之文本範疇，庶可補學界研究現況之不足。



## 徵引書目

### (一) 專著

- 〔唐〕房玄齡等撰：《晉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 年。
- 〔清〕朱克敬：《暝庵雜識·暝庵二識》，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83 年。
-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王利器纂輯：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》，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0 年。
-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》，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 年。
- 〔清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》，揚州：廣陵書社，2004 年。
-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張寅彭等編校：《越縵堂日記說詩全編》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0 年。
-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劉再華校點：《越縵堂詩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 年。
- 〔清〕李慈銘著，張桂麗輯校：《越縵堂讀書記全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21 年。
- 〔清〕崇彝：《道咸以來朝野雜記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2 年。
- 〔清〕管同：《因寄軒文初集》，收入嚴雲綬等主編：《桐城派名家文集》第 5 卷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4 年。
- 〔清〕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 年。
- 〔清〕劉聲木：《菴楚齋隨筆·續筆·三筆·四筆·五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 年。
- 〔清〕劉體智著，劉篤齡點校：《異辭錄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 年。
- 王汎森：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，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3 年。
- 王能憲：《〈世說新語〉研究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 年。
- 王維江：《「清流」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9 年。
- 史革新：《晚清理學研究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4 年。
- 朱傳譽編：《李慈銘傳記資料》，臺北：天一出版社，1979 年。
- 朱維錚編：《劉師培辛亥前文選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8 年。
- 余嘉錫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。
- 余嘉錫：《目錄學發微·古書通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。
- 余嘉錫：《余嘉錫論學雜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。
- 周祖謨主編：《余嘉錫先生紀念文集》，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89 年。
- 唐長孺：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 年。
- 徐世昌等編纂；沈芝盈、梁運華點校：《清儒學案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 年。
- 張桂麗：《李慈銘年譜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 年。

- 張舜徽：《清人文集別錄》，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。
- 郭康松：《清代考據學研究》，武漢：崇文書局，2001年。
- 彭明輝：《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》，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5年。
- 閔爾昌編：《清碑傳合集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88年。
- 黃濬：《花隨人聖庵摭議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書店，1983年。
- 楊國強：《晚清的士人與世相》增訂本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7年。
- 劉強：《世說新語研究史論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9年。
- 蔣廷黻：《中國近代史大綱》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盧敦基：《彷徨歧路：晚清名士李慈銘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19年。
- 嚴壽澂：《近世中國學術思想抉隱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〔美〕艾爾曼著，趙剛譯：《從理學到樸學：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》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(二) 期刊 (與專書論文)
- 毛孟啓：〈考據之名，義理之實——試論余嘉錫的小說研究特色〉，《華中學術》2020年第1期，頁92-104。
- 王小華：〈晚清前清流探略〉，《重慶工學院學報(社會科學)》第22卷第2期(2008年2月)，頁130-132。
- 王標：〈作為文化實踐的讀書——以李慈銘《越縵堂日記》為中心〉，《杭州師範學院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2007年第4期，頁14-21。
- 江建俊：〈玄風中的反玄〉，收入江建俊：《于有非有，于無非無——魏晉思想文化綜論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9年，頁375-414。
- 江建俊：〈魏晉「忠孝」辨〉，收入江建俊：《于有非有，于無非無——魏晉思想文化綜論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9年，頁315-373。
- 吳冠宏：〈「玄解」《世說》：以「海岱清士」、「見此張緩」兩則為示例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70期(2021年12月)，頁1-32。
- 吳冠宏：〈余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《世說新語》的現象考察〉，《東華漢學》第9期(2008年12月)，頁107-140。
- 吳冠宏：〈余嘉錫箋疏《世說新語》之詮釋特色及其文化意義初探〉，《成大中文學報》第22期(2008年10月)，頁1-22。
- 吳冠宏：〈魏晉「方正不阿」及「與世委蛇」之人物論述的探索——從余嘉錫箋疏《世說新語》所揭示之兩種甯武子之愚談起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29期(2008年12

月)，頁 157-192。

馬建強：〈李慈銘的《世說新語》研究〉，《常州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 14 卷第 4 期（2013 年 7 月），頁 79-83。

張明：〈《世說新語箋疏》所載李慈銘批校校正（一）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9 年第 4 期，頁 49-57。

張明：〈《世說新語箋疏》所載李慈銘批校校正（二）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9 年第 5 期，頁 52-58。

趙慧峰：〈晚清清流與同光政局〉，《煙台師範學院學報（哲社版）》1996 年第 1 期，頁 41-46。

劉強：〈李慈銘《世說新語》批校的特色與價值〉，《名作欣賞》2019 年第 11 期，頁 65-69。

蔡長林：〈長日將盡，典型宿昔——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乾嘉情懷及其意義〉，《人文中國學報》第 20 期（2014 年 9 月），頁 113-163。

### （三）學位論文

查時傑：《從《越縵堂日記》看晚清的清議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，1964 年。

盧敦基：《李慈銘研究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博士論文，2010 年。